

中国为何不会 统治世界

[美] 孔浩烽 (Ho-fung Hung) | 著
沈莉 | 译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中国为何不会 统治世界

[美] 孔浩烽 (Ho-fung Hung) | 著

沈莉 | 译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 / (美) 孔诤烽著; 沈莉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11

书名原文: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Contemporary Asia in the World)

ISBN 978-7-5086-6587-0

I. ①中… II. ①孔… III. ①国家战略-发展战略-

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0112 号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Contemporary Asia in the World) Ho-fung Hung

Copyright © 201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

著 者: [美] 孔诤烽

译 者: 沈 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6-236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587-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前言

1769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写道：“在中国，一切都由各大政府部门决定，它们相互制约，其拟任职的官员只有通过严格的审查之后才会被任用……在这样的执政环境下，当朝天子几乎不能武断地使用权力……在那里，人们的生命、荣耀和福祉都被国家法律所保护……当我们的欧洲贵族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们是会欣赏还是会脸红呢？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去模仿。”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理想化描述看起来似乎有点儿滑稽。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有一些轻视中国哲学家，其观点中存在很多对中国的曲解。例如，康德曾说，“美德和道德这些概念从来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脑海中”；而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人只对宗教祭祀和礼仪规矩有高度的兴趣”。

这些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对中国带有传奇化或是种族主义的观点，不能仅仅归因于他们缺乏对早期中国的了解。因为早期的游客、商人和传教士都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些记载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对早期中国王朝的严谨记录。启蒙运动者对中国的曲解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情况。在中国“艺术风”盛行时期（*chinoiserie*），欧洲陶醉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和内部和平，这些启蒙运动者将中国作为他们思辨的工具。伏尔泰是专制制度的强烈拥护者，他支持专制君主腓特烈大帝（Frederik the Great，普鲁士国王）并视之为进步力量。他将中国描绘成专制主义最成功的典范。但是，许多启蒙时期激进的哲学家更深信公民主权，并把中国抨击为处于黑暗中的国家，认为中国处在专制制度下，社会和文化中存在普遍的腐败现象。

尽管目前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报道，但是这个经济上已经崛起并且在政治影响上引起西方广泛关注的国家，依然会因为西方部分作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不同，而使其形象在西方比较主流的学术性著作中被曲解。也有一些西方作者使用强势、完美、极端不同的中国形象来支持他们批判西方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腐败和低效。

伏尔泰和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调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几乎没

有直接影响（尽管这些言论后来被用以维护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合法性）。当今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全球知识体系中的西方霸权言论仍然持续存在。尽管会受到中国政府机构的审查，但是西方关于中国的言论依旧在快速地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自我认知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中国的保守势力从来都毫不掩饰地采用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褒奖以捍卫中国的现状；另一方面，很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则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对于中国的偏见，号召“全盘西化”，甚至把西方无情的干涉看成是改革动力。

与中国发展相符、真实且完整的理性言论尽管会给读者呈现中国复杂的一面，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西方政府制定出更合理和清晰的对华政策，也有利于在中国国内形成积极的言论。撰写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时，作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观点和评论的影响，但是，以当前中国经济繁荣为题材来构筑一个与事实相符且真实的论著，并不意味着要假装对现有的事件不带任何个人的偏好。当然，仅凭作者的观点和政治立场来影响相关证据的搜集和分析也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名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美国学者，我对中国当然有着自己的看法。我的家族史和我个人的发展都与中国紧密相连。我

的外公作为一名学者参加过抗日战争，早年出于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高度期望，他于 1949 年带领全家老小从香港迁回广州，投身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1957 年初，也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他由于不合时宜地批判了苏联而被下放到农村，并在农村度过了他大部分的余生。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得到平反，但不久就去世了。我母亲在 1958 年独自一人回到香港与那里的亲戚住在一起。但是我的叔叔和阿姨依旧留在大陆，并且经历了“文革”。我总能感受到从母亲和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对于正义和知识的渴望。我的知识观的初步形成就是源自母亲家族中发生的故事，源自母亲对童年的怀旧，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香港回归前夕当地的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我的亲戚们成为了中国繁荣的受益者，他们把其所得当成是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他们的补偿。

我个人的经历让我对中国，以及处于中国巨人影子下的其他亚洲国家感到担忧、好奇和关切。我运用在社会学科所习得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些经历引导我从事了两个主要的研究项目，并且成就了我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首先，我通过对现代和当代时期的批判来描绘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源和细节。这个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的断言》（*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011)。其次，我主要探究中国经济繁荣的根源，揭示其核心动力，并探究中国经济复苏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本专著就来源于此研究。

我对中国政治经济繁荣的研究始于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学习期间。最初的努力得益于我出色的同事们——他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所提供的真知灼见，特别是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和伊桑·迈克逊（Ethan Michelson）。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后，我的导师和同事，包括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乔尔·安德里亚斯（Joel Andreas）、梅尔清（Tobie Meyer - Fong）、比尔·罗依（Bill Rowe）、贝弗莉·西尔韦（Beverly Silver）和蔡欣怡（Kellee Tsai），都帮我将研究置于历史性和比较情景的分析之中。

关于这个研究的一部分内容，我在不同的地方做过演讲，包括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州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的讨论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学中心的研讨会、耶鲁大学关于历史与文化和社会的研讨会、西北大学的亚太政治讨论会、耶鲁大学的比较研究研讨会、巴西联邦德圣卡塔琳娜州大学的国际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研讨会、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的“中国年”讨论会、香港法国中心

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讲座、南加州大学中国经济大会、宾州州立大学“全球亚洲”会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中国崛起”大会、多伦多约克大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会议、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加尔各答研究发展学院的“中印比较”国际研讨会、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金砖四国研讨会、莫斯科俄罗斯总统社科院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盖达尔论坛以及一些新学校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研讨会。这些会议和报告以及听众的评价和建议帮助我完善了论据。我也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提供的至关重要的学习氛围。这些资料 and 经历在 2013 年夏天我访问中国人民大学以及 2014 年夏天访问新加坡时逐步成为我的手稿，那些夏天快乐而又富有成果。

特别感谢：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罗比·巴奈特（Robbie Barnett）、鲍勃·布雷内（Bob Brenner）、罗伯特·巴克利（Robert Buckley）、阿米亚·巴格奇（Amiya Bagchi）、迈克尔·布汤维（Michael Burawoy）、常家墩（Gordon Chang）、尼斯·科瑞夫（Nitsan Chorev）、帕特里克·切瓦尼（Patrick Chovanec）、约瑟·毛里·多明戈（Jose Mauricio Domingues）、邓国声（Deng Guosheng）、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普瑞森·杜瓦拉（Prasenjit Duara）、冯仕正（Feng Shizheng）、马克·福瑞泽

(Mark Frazier)、爱德华·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伊莱·弗里德曼 (Eli Friedman)、托马斯·戈尔德 (Thomas Gold)、杰克·斯通 (Jack Goldstone)、杰夫·汉德森 (Jeff Henderson)、黄平 (Huang Ping)、比尔·赫斯特 (Bill Hurst)、鲍勃·卡普 (Bob Kapp)、伊丽莎白·科尔 (Elisabeth Kol)、帕特克·科兹涅瓦茨 (Patricio Korzeniewicz)、李静君 (Ching Kwan Lee)、丹尼尔·林克 (Daniel Lynch)、吉姆·迈赫尼 (Jim Mahoney)、里欧·帕尼奇 (Leo Panitch)、迈克尔·贝蒂斯 (Michael Pettis)、西德尼·瑞特博格 (Sidney Rittenberg)、莫瑞·鲁宾逊 (Murray Rubinstein)、马克·赛尔顿 (Mark Selden)、史宗瀚 (Victor Shih)、道斯·翰林格 (Dorothy Solinger)、斯贝斯坦·沃格 (Sebastian Veg)、杰夫·沃斯姆 (Jeff Wasserstrom)、温铁军 (Wen Tiejun)、赵鼎新 (Zhao Dingxin) 对本书提出的见解。非常感谢张绍华 (Zhan Shaohua)、王英遥 (Wang Yingyao)、莉莉·墨菲 (Lily Murphy)、黄玲丽 (Huang Lingli) 提出的建议和对研究的帮助。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辑安妮·路腾 (Anne Routon) 对本书的支持。与我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另一本书一样，本书的出版同样得益于她的文化品位和编辑建议。我也要感谢艾米·万斯特 (Amy Vanstee) 和安妮·阿尔瓦 (Annie Barva) 对

手稿所做的文字编辑工作。

本书的许多内容都来自我近些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第1章是对《清朝中国的农业革命和精英繁衍：资本主义演变辩论的再审视》（*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lite Reproduction in Q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ebate Revisite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 no. 4 (2008)] 的修改。第3章来自《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进退两难》（*America's Headservant? PRC's Dilemma in the Global Crisis*）[*New Left Review*, no. 60 (2009)]，以及《北京与银行：纸老虎的金融》（*Beijing and the Banks: Paper - Tiger Finance*）[*New Left Review*, no. 66 (2011)] 的更新。第5章的一些数据来自《中国：美元霸权的保全还是挑战》（*China: Savior or Challenger of the Dollar Hegemony*）[*Development and Change* 44, no. 6 (2013)]。第6章的一部分内容来自对《过度积累的中国与全球危机》（*China and the Global Overaccumulation Crisi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5, no. 2 (2008)] 的更新和重写。

我的生活伴侣赢慧（Huei - Ying）给予我极大的鼓励、自信心和批判精神，这些都促使我完成专著。她总是提醒我，时刻保有最初选择社会科学研究的情怀。书中任何幼稚的观点和缺陷都

逃不过她的法眼。我们的孩子们——亨利（Henry）和海莉娅（Helia），伴随着我写这本书而茁壮成长。他们对知识的热情也时刻提醒我要保持好奇和敏锐，而不至于落后。我希望他们对自己无意中做过贡献的这本书感到骄傲。

引言 “中国热”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出口行业遭遇重创。然而，几个月后，中国经济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两位数增长速度强势反弹。在全球经济面临崩溃时，中国经济却正经历着超过30年的持续增长。这些成果使得那些左翼和右翼作家对世界的未来充满幻想。

可以肯定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对中国的乐观有着不同的原因，这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称为“中国热”（Sinomania，2010）。中国的崛起和它从危机中表现出的明显的强劲复苏态势，代表着巨大的、全新的和无限的利润。而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盈利能力的扩张空间看起来却越来越窄。例如，商学院教授、资深对冲基金交易员安·李（Ann Lee）的畅销书《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把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视为我

们最好老师的一个开明指南》（2012）引起了商业媒体和咨询行业的广泛好评。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参与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曾指责中国“夺取”美国就业，而实际上他本人却是中国式商业运作模式的崇拜者，因为他曾在2008年纽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中指出：“在中国，人们不断向海洋倾倒渣土以实现填海造地的目的。我问建筑工人：‘你们如此行事做过环境影响调查吗？’工人回答：‘什么？’我问：‘你需要批准吗？’‘不。’那个中国人说。但是，如果我向纽约市的海洋里扔一个石子，估计我将会被处以死刑。”（Heyer, 2008）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西方统治的终极挑战。有些人断言“中国模式”是建立于国家主动干预下的经济发展（Ramo, 2004）。他们将这种“模式”视作新自由化经济的一个更进步和更高级的替代形式。这种模式以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力量为前提，并从20世纪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自由市场改革开始盛行至今。“中国模式”被称赞为能够更有效地处理经济危机，并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

中国的成功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些对西方民主制度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对威权型政府美德的思考。例如，《时代》杂志中的一

篇文章,《为什么中国把“市场经济”搞得比美国更好》指出,“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所显示的极大的讽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能比美国民选政府更好地控制‘市场经济’危机”(Karon, 2011)。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英国共产党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社的前任编辑,他一直在极力庆祝“全球新秩序的诞生”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他在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中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描述成“中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开始”。这本书连续几个月进入了美国和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并被主要金融出版社看好。这不是这类左翼作家往常所能得到的待遇。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部分建立在故意夸大中国情况的基础上(Hung, 2003),而被西方世界所称赞的“中国奇迹”以及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的表现,也经常被片面地理解成“中国模式”的繁荣。中国是个庞大的经济体,其发展取决于私营和国有部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国经济由三个主要引擎所带动:国内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自从19世纪中期清政府被欧洲的炮舰打败后,这三个引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对权重就受到中国长久追求现代化过程和路径的影响。因此,任何缺乏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和历史性的观点都是不全

面的。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概述中国经济热潮的历史起源，以及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导致这种经济繁荣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本书详细阐释了 18 世纪时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自发出现，而当时中国经济正是早期现代世界中最繁荣和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在 19 ~ 20 世纪早期未能像日本那样促进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业化发展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本书认为，正是由于处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在区域、全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下，中国的这种繁荣才成为可能。

正如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 1997, 1998）所说的，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根本不同（Aglietta and Bai, 2012; cf. Nee and Oppen, 2012）。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动力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具有一般性的，尽管资本主义总是出现在历史的和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政治结构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定的社会关系、国家机构和地缘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将呈现出特殊的样子，并为全球秩序带来特定的后果。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承下来的国有企业如何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又是如

何借鉴这方面经验的 (Y. Huang, 2008;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弗里德里克·詹姆森曾经打过比喻,“(资本主义)系统最好被看作是一种病毒……而它的发展就如同病毒传染”(1998: 139-40)。这也说明资本主义的病毒本质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受感染宿主的反应和行为仍会根据其身体的先决条件和特点而有所不同。本书不是试图揭示出一个不存在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相反,本书在于解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萌芽、繁荣和衰败。

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探索中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及其繁荣的局限性,侧重于探讨四种有关中国如何重塑世界的常见观念,并就现实情况对其进行评估。第一个观念是,考虑到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中国正在挑战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和全球自由市场,以及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第二个观念是,中国通过提高庞大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避免了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面临的收入两极分化的长期趋势,“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赶上发达国家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机会。第三个观念是,中国正在挑战,甚至取代西方对世界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第四个观念是,在起源于美国和